

# 理论复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鲍德里亚<sup>※</sup>

◎ 童小畅

**【摘要】** 为了论证多年以来让·鲍德里亚的思想理论发展从未远离马克思主义脉络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文论的“互文性”概念来分析鲍德里亚的理论架构以及思想运动载体，在综述各个时期理论界对于鲍德里亚的马克思主义身份进行辩认的同时，探讨鲍德里亚文本对话的多声部性，以及诸声部在其写作形式、精神以及内核中展现出来的统一性与平等性，并力图找到一种能够阐释有关鲍德里亚同期思想活动的桅杆理论，从而重新建立甚至标榜鲍德里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不可泯灭的身份。

**【关键词】** 复调；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2) 01-0011-6

多年来，鲍德里亚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话题人物。从1996年盛宁在《读书》杂志发表了《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解剖学》和《危险的让·鲍德里亚》两篇文章开始，到2001年其早期专著《消费社会》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出版的还有他的《物体系》），再到近两年来学界对其研究热情的逐渐高涨——鲍德里亚俨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重点“关照”的对象之一。

最开始的鲍德里亚，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当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运行中出现的符号化的新特征，并将这种当代社会的符号化形态标注为“消费社会”。此前他就

曾经说过：“消费……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sup>[1]</sup>不仅如此，消费甚至“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sup>[2]</sup>，而是一种“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sup>[3]</sup>。当代物如果要被消费，“（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sup>[4]</sup>这样的论断显然让人激动异常。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当中，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尤其是文化机制的批判，从来就是其精髓所在。而鲍德里亚顺着巴特的思路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的把握与批判，从结构性层面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所裹挟而来的新特征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工业化及缠绕其间的意识形态幽灵；相应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符号化和文化转型在日益发展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催化下显得更加面

※ 本文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研究”成果（05JJD750.11-44006）。

〔作者简介〕 童小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

目模糊、不可捉摸。作为一名曾亲历“五月风暴”的后68年学者,青年鲍德里亚所面临的“敌人”确实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以金属、鲜血和武器这样的形态动手,而是像毒气一样弥漫在社会的上空,或者,就如《黑客帝国》中的母体一样俨然而立。当《消费社会》和《物体系》出现在中国学界之时,许多研究者如获至宝,这是因为鲍德里亚的思想与理论已经开始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与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结合到一起,这使得文化研究的学者在文化工业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拜物教批判、当代传媒批评等领域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思想资源。

然而,鲍德里亚的思想运动并未就此打住,他也并不甘于在“五月风暴”骤然停止之后反复吟唱那种人文主义者的哀叹,他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符号价值钉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到《生产之镜》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批判,再到《象征交换与死亡》当中实现新的理论落脚,鲍德里亚用近十年的时间进行着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清理。早在1989年,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教授就出版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它》一书。作为批判学派在美国的学术继承人,凯尔纳以一个广义的左派知识分子视角对鲍德里亚进行了分析、解读与质疑。在他看来:首先,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状况的描述并没有在整体上超越批判学派的框架,他对于当代社会控制机制的描述仍然是建立在以马尔库塞《单面人》当中描述的状况的基础之上的;其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并没有形成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作为理论的应用,鲍德里亚的思想无法真正介入到当代政治生活和解放性运动实践当中去。<sup>[5]</sup>应该说,凯尔纳对鲍德里亚,尤其是其早期思想的分析和评述基本是中肯的;作为第一部研究鲍德里亚的专著,该书也完成了其自身任务。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学者巴特勒对凯尔纳的观点不尽赞同。在他看来,凯尔纳戴了一副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观察鲍德里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进行研究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结果是已经预设好的。这样,对

鲍德里亚研究的结论必然是否定性的。<sup>[6]</sup>巴特勒所评有其学理依据,但这并不影响凯尔纳的著作在中国甚为深远的影响。近来学者不仅多引用其书,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分析流程也成为了许多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批判的起点。

2004年出版的《走向后马克思》一书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鲍德里亚思想的专著。作者在凯尔纳的解读基础之上,系统地清理了鲍德里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符号学之间的思想谱系与图示。<sup>[7]</sup>该书掀开了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批判性解读的序幕。应该说,随着对鲍德里亚了解和研究的逐渐深入,尤其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等作品在中国的逐渐流传,鲍德里亚这位一开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的思想家的面目突然开始变得模糊。尤其是《生产之镜》,更是使他被一些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面被清除出来,迅速变身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门内逆子”和“自以为是的疯家伙”<sup>[8]</sup>。2005年《生产之镜》中文版出版前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等相关问题成为继消费社会理论与批判之后一大新的理论研究主题,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和批判性研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把鲍德里亚开除出了队伍,还把清算的矛头指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等当代左翼思潮,最终的结论则是: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 二

在理论界几年来的穷追猛打之下,鲍德里亚正式地被开除出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已经“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否有效?甚至,这样的结论表述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长时期以来,关于某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之声总是萦绕于我们的耳边。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革命实践上,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总显得刀光剑影。仅从语义上进行分析,某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述乃是对某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类与非类的界定。这样的界定过程有一个预设前提,即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坚硬

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内核。问题可以从这里展开：是什么力量从逻辑上保证着这一内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的定位所在？又是谁从实践上保证着某一种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阐释是这一内核唯一正确的表述？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坚硬的内核？或者，这根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想象？

让我们先将这一问题从极其敏感的意识形态纷争当中拿出来，放到纯粹文本分析的范畴当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之间是否是一种太阳系式的放射状关系？克里斯德瓦在《符号学》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sup>[9]</sup>这一结论当然是滥觞于结构主义思潮的互文性理论宣言。在这样一些理论家看来，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线性的或者放射性的，而是以一种网状的形式呈现出来。卡勒则指出：

“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本文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原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sup>[10]</sup>通过近年来对鲍德里亚的研究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来源及构成相当复杂。仅以早期思想而言，除了来源于列斐伏尔和德波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于巴特等人的符号学方法，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脉络就是经由巴塔耶而来的以涂尔干

和莫斯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这若干的思想资源在鲍德里亚的作品中的呈现，很难清理其主次关系。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在当代思想碰撞和学科融合的格局之下，如果仅仅因为鲍德里亚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写作就简单认为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非常幼稚。而以结构主义理论的视野而言，鲍德里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地图上肯定是不能被抹掉的。

应该说，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分歧本质上产生于学科视野的不同。近来研究者多发现了鲍德里亚思想当中的多种悖逆性。首先是涂尔干：相对于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看作世界发展的内在力量、马克思将基于生产活动的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涂尔干到莫斯的实证性社会学的视角本身，已经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思考的空间。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涂尔干的研究将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充实了由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梅林坚定地认为鲍德里亚是一个涂尔干主义者，后者的思想资源在鲍德里亚的整个思想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sup>[11]</sup>作为涂尔干的外甥和学术继承人，莫斯终身所追求的科学化的社会学研究，是与涂尔干一脉相承的。他有关礼物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塔耶，以及鲍德里亚。在莫斯那里，他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上，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模型，以此来证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只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而已。莫斯认为，在那些仍然处于贫困和饥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仍然持有一种关于财富的不同的观念，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仍然是存在的，这种交换并不基于交换价值以及积累财富的目的。莫斯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冬节。在印第安人中间，那个节日中所有交换的礼物，其作用是维系部族之间的关系。“所有冬节的礼物都是建立在回赠的义务之上的。”<sup>[12]</sup>莫斯在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显然已经超越了精神



层面与物质层面的界限,而是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魔术”式的联系——这是一种对社会存在方式的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把握。莫斯认为,礼物的给予者不仅仅给予了一个物,而且给予自己的一部分,作为礼物的物与给予者之间是不能分割的:“礼物从来无法完全从交换行为的施与者那里独立出来。”<sup>[13]</sup>基于给予者和礼物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礼物交换的行为就构成了一种义务性和往复式的交换关系,并由此形成了社会的往复式作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对冬节的研究表明,如果接受了礼物而没有回礼,将意味着失去别人的尊敬和地位。如果从精神暗示的角度而言,问题将更加严重:在波利尼西亚,不进行礼品的相互交换,意味着会失去神灵的庇佑——而这恰恰是古代人所认为的现实权力和财富的源泉。莫斯区分了三种义务:首先是给予,这是一个必要的初试步骤,它创造并维持着社会关系;其次是接受,如果拒绝接受,则意味着拒绝社会结合;回礼则是为了证明某人的磊落、荣誉和财富。在莫斯礼物交换的概念化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不可让渡性”。在商品经济中,通过私有财产的观念,物和人有一种强烈的分离倾向。一旦物品得以出卖,则意味着它的拥有权完全地为新的主人所占有。物也就从此被让渡与新的拥有者。然而,礼物交换当中,物是不能进行让渡的。与其说这是一种卖出和放弃,不如说其实是一种借贷关系。事实上,给予者的身份总是和被给予的物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导致了礼物总是具有一种强制性的互酬的力量。因为礼物的给予总是与回礼联系,给予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必须归还的礼物性债务。因此,礼物交换就形成了一种给予者和接受者的相互依赖。在莫斯看来,无需归还的“自由”的礼物,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无法创造社会关系。涂尔干倡导通过概念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凝聚力,莫斯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亦即,社会的结合是通过礼物交换来实现的。然而,在莫斯自己那里,他并不热衷于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尽管,这一发现本身已经从理论上具备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他更愿意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对象上。莫斯将自

己的研究定义为一种科学的活动,他为《金枝》的作者弗雷泽所作的讣告中写道:“关于艺术的作品可以仅仅是示意性的,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必须真实且包含所有的相关性。”<sup>[14]</sup>也就是说,在莫斯那里,礼物的交换是存在于经验性的社会学视野之中的。

将礼物交换的原则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是巴塔耶。巴塔耶认识到,许多人类行为都可以在损失的范畴内进行理解。通过“冬节”可以解释,所有的这种损失形式都是为了更加凸显“胜利者”的地位,哪怕这种胜利是通过损失来确认的。在巴塔耶看来,礼物的交换是一种主体超越给予者的仪式。尽管给予时将物品赠送给了对方,但是同时,主体占有了一种超越。当主体认为这是一种仪式时,他便拥有了一种权力。鲍德里亚的理论模型,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维体系当中。从涂尔干而来的实证主义人类学视野,并不将社会置于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格局当中,而是把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具有张力性结构的整体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所谓的“物”,甚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有着深刻的理论联系。在消除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隔阂之后,物便具有了相当程度上的精神深度。同时,作为“物”的当代人的命运,也在鲍德里亚对于当代社会的描述和批判中得以展开。“人”在鲍德里亚那里,也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术语和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伴随着他对社会整体转型的批判而得以凸显。

### 三

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其观察视点与理论路线总是要和某种科学性思维联系在一起。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的科学性视野成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前设性条件。这一情况的发生,并非是思想史层面上马克思的理论之失,而更重要的则是在社会史层面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致。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理论基础乃是新教伦理和理性至上的哲学突破。然而,这两者从本质上并没有完全超越基于

逻各斯中心的西方思想传统。无论是本质—表象、物质—精神还是理性—审美这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实质上仍然在传统思想框架下进行。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它的生产方式转型和社会组织架构布局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其相应的、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精神架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架构的真空,让马克思在抛开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精神与思想表征(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只能起到遮盖布的作用)之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猥亵性,并让他在批判这一罪恶的生产方式时将生产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与使用价值的解放作为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然而,对涂尔干主义的接受使鲍德里亚的写作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所有的人类关系,必然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之下,这种关系也根本无法用所谓物质—精神的二元关系来进行界定;也就是说,人类关系肯定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性或生产性的现象化。于是,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通过解放使用价值来批判交换价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寻找一种经济学的积极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有局限的、无用的资产阶级批判,它只比朝向社会的‘积极作用’的庸俗人生哲学多走了一步而已。相反,巴塔耶通过一种贵族化的观点扫除了主人与其死亡斗争的主奴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再着迷于资本视野一个开始——所以引导它或跟随它的理论都将比它更为激进。”<sup>[15]</sup>这样的激进论断其实并不是鲍德里亚突发奇想的发明创造,而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推进深入的结果。从卢卡契对于阶级意识的分析,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再到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这样一条思想线索的核心乃是不断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构造进行探究与批判,并希望从中找到革命的可能性与契机。鲍德里亚的极端激进思想,并不是对这一整条思想线索的否定,而恰恰相反,是这一思想线索走到了极端性的点并发生朝向自身的反转的开始。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断使用符号系统对原有的象征系统进行攫取和偷换的批判;也是对这一过程当中人类关系朝向不可复

归的透明化和符号化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自身的精神构造的打造并开始朝向完美的系统形态发展的思想表征,也是符号与物的关系完全倒置的思想表征。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上,鲍德里亚写作所体现的矛盾性和内在悖逆性,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文本。

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和阶段的判断,使得鲍德里亚在理论身位上继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但也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在批判理论的思想家看来,批判理论本身首先是一种批判性介入的姿态,作为主体的批判主体“处在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他与某一特定阶级发生冲突,并最终处于因而产生的与社会总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个体不同于资产阶级哲学的自我,他根本不是小数点;他的活动是社会现状的表现。”<sup>[16]</sup>这样的思想者身位和姿态使得批判理论活动具有这样的倾向:“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消除这种或那种弊端,因为它认为这类弊端与社会解构的组织方式有必然的联系。”<sup>[17]</sup>在批判理论家那里,他们假定社会危机存在的永久性,强调的是始终的批判。但是,无论是高扬审美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还是提倡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无一例外地在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之外设置一个牢固的批判基点作为现存世界的它者,并以此形成与现实的张力性结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成问题的:“反映现实并进入到现实的批判性维度当中,这并不是理论的终结。这只是启蒙运动那个不朽的时代虔诚的欢呼……诉诸于辩证法看起来是不行的。”<sup>[18]</sup>对于当代社会飞速变化的事实,无论是批判学派还是其它传统理论,其依据的张力性结构都已经开始垮塌:既然已经不再有先在的确定性,那么辩证法的逻辑基础也成为问题。对于这一当代理论已然无所依傍的情态,他接着说道:“理论仅仅具有描述性和分析性是不够的,它自己必须成为它所描述的宇宙当中的一个事件。为了做到这一点,理论必须承担并逐渐变成加速的逻辑。它必须扔掉所有的指涉并只能以

未来为傲。理论必须准时地运作,并以对当前现实的有预谋的失真作为代价。”<sup>[19]</sup>在鲍德里亚写作的复调当中,一种声音发源于当代社会变化的现实,它的背后是涂尔干主义的人类学视野;另一种声音则发源于理论本身的碰撞,它的背后则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时代性位移。而放弃理论的轴心地位并使其跟随社会变化而加速的观点,可以再次回溯到海德格尔的哲学观:无疑,这都是对近代以来过于自信的主体性哲学的反拨。无独有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莱齐奥说:“我们不可能再像萨特时代的作家们那样傲慢地以为,一本书就可以改变世界了……今天,写作者们只能记录下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软弱……当下的文学是绝望的文学。”<sup>[20]</sup>

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了著名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文学的狂欢节化”概念。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小说创作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主人

公的关系,偏向于在共时性状态下平行地展开多种意识,从而形成各个主人公的意识、视野和声音的一种共存关系和相互作用。尽管这多种的意识、声音和视野充满了内在的悖逆和矛盾,但这并不影响文本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其西方传承在鲍德里亚复杂而多声部的理论写作当中呈现出来的形态。那么又如何解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呢?布鲁姆的“影响焦虑”或可作答。在1960年代横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风潮之下,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纷纷打出政治正确的旗号,思想界的论战甚嚣尘上。身处其中的鲍德里亚自不可能置身事外,而1968年的革命行动匆匆的失败成为一剂催化剂,使鲍德里亚必须迅速寻找理论的突破口。然而,作为先在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在鲍德里亚的写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仅仅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身,我们就会清楚地被告知:永不可能。

#### 〔参考文献〕

- 〔1〕〔2〕〔3〕〔4〕布希亚(鲍德里亚).物体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8,8,8,8.
- 〔5〕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 〔6〕Rex Butler, Jean Baudrillard. 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London:Sage,1999.
- 〔7〕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8〕张一兵.对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J].哲学研究,2006,(11).
- 〔9〕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 〔10〕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3-4.
- 〔11〕William Merrin. Baudrillard and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05.
- 〔12〕〔13〕Marcel Mauss. The Gift :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M]. New York : W.W. Norton, 1990, 40,31 .
- 〔14〕Marcel Fournier. Marcel Mauss: a Biograph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 〔15〕Baudrillard. When Bataille Attacked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f Economy[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6, (11).
- 〔16〕〔17〕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A].霍克海默集[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85,182.
- 〔18〕〔19〕Jean Baudrillard.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M].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88. 97, 99.
- 〔20〕08年诺贝尔奖尘埃落定:法国作家克莱齐奥获奖[EB/OL]. <http://bbs.frguo.com/a/a.asp?id=833285>.

(责任编辑 苏 宁)